

收入不平等何以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 基于乡土逻辑变迁视角的分析

尤 亮^{1,2}, 马千洪²

1. 山西财经大学平台经济研究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乡土逻辑是农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和行为准则, 探究乡土逻辑下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从乡风文明视角出发,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以 2016 年和 2021 年陕西富县两个行政村的整村微观面板数据为基础,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探讨“乡土逻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抑制作用, 且这种抑制作用对非普通、高学历和中青年组的农民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 以“礼治”为特征的传统乡土逻辑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 而在现代网络渗透下形成的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基于此, 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将农民的收入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并强化乡土逻辑蕴含的人情规范,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营造良好的价值观氛围。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收入不平等; 乡土逻辑; 现代网络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12-0208-11

How does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peas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logic change

YOU Liang^{1,2}, MA Qianqi²

(1. Institute of Platform Economy,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Local logic is the value consensus and code of conduct formed by peasants in their common lif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eas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under local logic is to provide spiritual impetu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easants, using the tracking data of two village in Fux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in 2016 and 202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eas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iscuss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local logic in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inequality will inhibit peas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is inhibition is more obvious for high social status, highly educated and young peasants.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local logic characterized by "rule of Rites" will positively adjust the impact of internal income inequality on peasants' subjective

收稿日期: 2023-07-27 修回日期: 2023-11-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渴望及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71903117); 山西省研究生创新项目“乡土逻辑下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2022Y527)。

作者简介: 尤亮(1989—), 男, 安徽六安人,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区域发展。

well-being, while the changed local logic formed under the infiltration of modern networks will negatively adjust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easants' well-being. Based on th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channels of increasing peasants' income, control peasants'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strengthen the human norms contained in the traditional local logic, and create a good network cultural atmosphere.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inequality; rural logic; modern network

幸福最大化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必须不断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增长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涓滴效应并没有同等强度地惠及到每个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是中国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备受关注不同,学术界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关注有待加强。从全国农村地区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来看,2010年高收入组家庭(最高20%)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低收入组家庭(最低20%)的3.3倍,2016年扩大至9.46倍,2022年虽下降至9.16倍,但仍处高位,即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挑战。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一定的生活标准对现有生活状态和质量作出的主观认知评价。有关人类幸福的探讨最初起源于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即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属于哲学思想领域的伦理道德范畴^[1]。而对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最终要反映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或幸福感上^[2]。事实上,共同富裕不仅包括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3]。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础保障,精神富裕是物质富裕的价值升华。就物质生活层面而言,缩小收入不平等是重要关注点;就精神生活层面而言,提升农民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是重要着力点。

有关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4种观点,分别是收入不平等会抑制主观

幸福感、收入不平等会提升主观幸福感^[4]、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非线性影响^[5]以及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影响^[6]。这种矛盾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对象、研究样本或指标测度方法的不同。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探讨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仅能够反映个体收入差距的平均特性,而微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可以进一步反映个体在群体中的相对优势或相对劣势。更为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对个体的影响完全在于个体日常生活中所能直观感受到的贫富差距,与参照群体的状况紧密相关^[7],但从微观层面分析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专门聚焦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鉴于此,本文以村庄作为基本研究单位,采用微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探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传统乡村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既是维系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8]。在传统乡村,农民内生出了一套以“礼治”为特征的非正式运行规则,也就是人情礼俗维系着的熟人社会,是具备价值导向作用的精神文明集合,本文将其称为传统乡土逻辑。近年来,随着现代网络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社交软件在农民群体中的广泛应用,乡风文明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冲击下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表征和精神内涵,传统乡土逻辑逐渐发生改变,形成了信息流动下的新型人际交往格局,本文将其称为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事实上,乡土逻辑不仅是当地文化价值体系的现实投影,而且是当地村民对村庄行为规范和乡土秩序的集体认同和自觉实践,在凝聚人心和教化群众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推进,农业社会原本乡土味、慢节奏和原子化的生活方式逐步呈现出组织化、快节奏、交互性的现代生活特征^[9],乡土逻辑在现代网络的冲击下显现出了现代特征。那么,在乡土逻辑的视角下收入不平等会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何种影响?乡土逻辑的变迁是否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是值得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以“乡土逻辑”作为切入点,研究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探讨“乡土逻辑”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尝试进一步厘清收入不平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第二,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采用整村实地调研的面板数据,能够最大限度地廓清诸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鉴于农民以村庄为单位的社交观,本文以村庄为基本研究单元计算收入不平等指数,探究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 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的探讨

围绕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这一主题,学术界主要有 4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和负向隧道效应,认为收入不平等会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但相对剥夺理论和负向隧道效应侧重不同,前者源于人们的比较心理带来的负面感受,而后者源于预期未能实现带来的消极情绪。一般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会越低。在中国情境下,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收入差距扩大,致使中国居民幸福感下降,且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效应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10]。

第二种观点基于示范效应认为收入不平等会提升主观幸福感,当居民对未来经济地位产生可能改善的预期,将会容忍当前的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激励作用,即正向隧道效应。

陈钊等^[11]基于上海和深圳的居民样本,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会带来示范效应,美好生活的预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4]。此外,同质性参照群体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民工社会地位虽然低于城市居民,但因农民工的参照对象倾向于非城市居民,所以其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12]。

第三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马红鸽等^[13]发现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呈现出倒 U 型关系,即适当的收入不平等有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但过大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主观幸福感。与此相反,Komatsu 等^[14]发现以省际基尼系数和城乡人口收入比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 U 型影响,但以省际家庭人均收入比衡量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倒 U 型影响。

第四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Vezzoli 等^[6]发现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Ngamaba 等^[15]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较为微弱,并且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2. 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探讨

主观幸福感是由大量条件因素引发的个体心理状态,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16]。有关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从主观层面看,人们追求的并不是完全的收入平等,而是公平的收入差距,因而分配公平感是收入不平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机制^[17],当感知公平和实际公平不一致时,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发生改变^[18]。此外,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心理过程也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机制^[16]。从客观层面看,Alesina 等^[19]发现社会流动性在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提升美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会显著降低欧洲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原因在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较强,而欧洲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讨,为本文提供了经验和理论线索。然而,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仍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中作用的相关成果稀缺。鉴于此,本文基于整村调研追踪数据,探究收入不平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原因。

(二)研究假设

关于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至少存在两种解释观点:一是“相对剥夺说”。“相对剥夺说”是指个体通过与参照群体比较发现自身收入处于劣势地位而产生的负面感受,收入不平等会使人们滋生出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16]。在城乡中国背景下,我国农村人口占低收入群体的比例高达90%,并且存在结构性分化,通常对收入差距感知更加强烈,造成的主观幸福感损害可能更为严重。二是“改变预期说”。我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且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不断下降^[20]。而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并不会形成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会降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进一步地,根据解释水平理论,人们对距离较远的事物的描述具有抽象性,对距离较近的事物会更加注重细节,不平等指标在越大的地理范围内越难以捕捉其中的细节变化^[21]。因此,鉴于农民以村庄为单位的社交观,本文认为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会抑制农民主观幸福感,故提出假说H1:收入不平等会抑制农民主观幸福感。

事实上,传统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生活大为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低,所以才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在国家权力几乎不介入农村的情形下,儒家伦理构建了乡村秩序^[22],形成了以“礼治”为特征的乡土逻辑。自农耕时代起,乡土逻辑便构成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价值关怀,对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农村的数字化水平相距甚远^[23],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政策支持体系的逐步完善,现代技术和观念持续渗透到农村,最终将会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现状和农民的认知行为逻辑。倘若不理解乡土逻辑的根蒂,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快速变迁的大环境,诸如网络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农民的影响。探究乡土逻辑是否会作用于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先需要确定何为乡土逻辑。

本文认为传统乡土逻辑包括两部分,一为“乡”,二为“土”。“乡”指乡里乡亲,是相较于城市陌生社会而言的社会结构,即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村民知根知底,存在着较强的社会信任基础。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农民间的熟悉程度降低,出现了半熟人社会^[24],但乡土社会的核心仍然是“熟悉”“亲密”。在驻村调研过程中,当询问受访者的自身收入在村庄中处在哪个阶层时,受访者会毫不犹豫地给出答复,再从同村他人口中印证时,回复大致相同,间接可以表明农民仍然生活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社会空间中。“土”是指“本土”,是相较于西方阶级社会而言的“伦理本位”社会。在中国,儒家思想是统治中国政治和社会两千年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通过“礼”对乡村社会构建的过程,就是对人情进行规范的过程,即人情礼俗化。农民行为围绕人际关系展开,行动准则是人情规范。基于此,本文将传统乡土逻辑提炼为“熟人社会”和“人情礼俗”。由于传统乡土逻辑是人情机制维系的熟人社会,是承载人情的社会规范,所以当传统乡土逻辑发挥作用时,以“礼治”为特征的非正式运行规则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据此提出假说H2:传统乡土逻辑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

随着我国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体系的日渐完善,手机、电脑等智能终端在农村社会逐渐普及,城市正一步步引领和改变着乡村的生活方式^[25],农民之间的依存度逐步弱化^[26],现代网络深刻影响着当代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冲击着传统乡土逻辑的人情规范,逐渐形成了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一般而言,受信息获取范围和认

知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农民的比较对象大多是身边熟悉的个体。但现代网络可以帮助农民突破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打破时空限制,扩大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同时,虚拟社群的出现也改变了农村社会的交往格局,形成了信息流动下的新型人际交往格局,即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事实上,现代网络使得农民生活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环境中,城市价值观念的引入也使得传统乡土逻辑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表征和精神内涵。所以,变迁后的乡土逻辑扩大了农民的交往范围和社会比较范围,增强了农民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观念,当变迁后的乡土逻辑发挥作用时,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增强。基于此,提出假说 H3: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

乡土逻辑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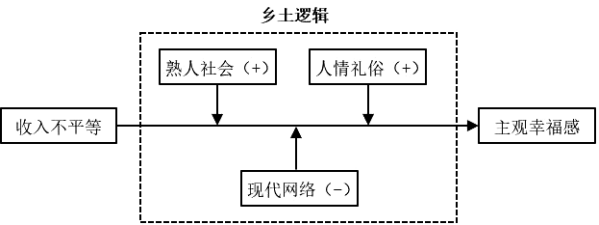


图 1 乡土逻辑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 2016 年 6 - 7 月对陕西富县两个相邻的苹果种植专业村的整村实地调研,并于 2021 年 7 - 8 月回访原受访对象。2016 年收回问卷 613 份,样本覆盖率超过 88%,2021 年由于部分农民身体不适、外出打零工等原因无法接受回访,共收回问卷 439 份,其中追踪样本为 398 个,追踪率达到 60% 以上,两次调研共回收样本 1 052 份。在基准回归中对两次调研样本进行清理和匹配,最终有效样本量达到 780 个。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农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使用农民自评生活满意度衡量农民的主

观幸福感。询问农民“总的来说,您对当前的生活有多满意?”,答案为 0 - 10 级的 Likert 量表,层级越高,意味着农民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样本数据中,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SWB) 主要集中在 5 ~ 8 级,约占样本总量的 70%。

2. 核心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

已有研究中对收入不平等指标的测度多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Kakwani 指数和 Canberra 指数等。本文选取个体微观层面的 Kakwani 指数来测度农民收入在参照组内的相对位次,以此得出收入剥夺指数。该指数具有无量纲性和相对性的特点,可以更加充分地反映个体收入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在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测量中使用较为普遍。

3. 工具变量:村内除本人以外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均值

囿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较多且难以被系统考察和测度,所以模型会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杨子砚等^[27]的“留一法”将“除本人以外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记为 *Snkakwani*。由于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具有“序”的特征,含有相对剥夺的内涵,当他人的相对剥夺感增强时,个体自身的相对剥夺感便会减弱,故除本人以外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情况与个体的收入不平等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原则。同时,村内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均值属于村庄层面的变量,与微观层面的农民主观幸福感分属不同观测层次^[28]。所以,除本人外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均值很难直接影响该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原则。

4. 调节变量:乡土逻辑

本文的乡土逻辑分为传统乡土逻辑和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传统乡土逻辑是人情机制维系的熟人社会,故使用社会信任 (*Believe*) 和礼金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 (*Linjin_con*) 作为传统乡土逻辑中熟人社会和人情礼俗的代理变量。变迁后的乡土逻辑是现代网络冲击下的新型人际交往格局,故使

用信息通讯费用的对数 ($\ln tongxun$) 作为代理变量。社会信任变量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分别为亲戚信任、本村村民信任、乡镇干部信任和城里熟人信任。每个维度的社会信任指标的题项从很信任至很不信任分别赋值 1~5,首先对其采取正向重新编码,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合成社会信任变量。

5. 控制变量

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分为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在个体层面上,选取受访者的婚姻状况 ($Marry$);在家庭层面上,选取受访者的家庭健康状况 ($Avehealth$)、土地面积 ($Area$)、家庭资产 ($Asset$)、劳动力人数 ($Labor$)、社会资本 ($Incontact$) 和家庭经济状况 ($Site$)。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和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SWB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0 为非常不满意, 10 为非常满意)	6.144	2.252
解释变量	$nkakwani$	Kakwani 指数	由 Kakwani 指数计算得到,取值为 0~1	0.378	0.247
	$ncanberra$	Canberra 指数	由 Canberra 指数计算得到,取值为 0~0.005	0.002	0.001
工具变量	$Snkakwani$	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均值	村内除个体外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均值	0.834	0.098
控制变量	$Avehealth$	健康状况	家庭人均健康支出的对数	6.964	2.975
	$Area$	土地面积	家庭种植土地面积 (亩)	8.088	3.994
	$Asset$	家庭资产	家庭拥有的小轿车数量 (辆)	0.386	0.515
	$Labor$	劳动力人数	农业种植劳动力 (人)	2.165	0.705
	$Incontact$	社会资本	日常接触人数的对数	4.433	1.058
	$Marry$	婚姻状况	1 为已婚, 0 为其他	0.950	0.218
	$Site$	家庭经济状况	收入在村庄中的位置评价 (0 最底层, 10 最高层)	2.981	2.421
调节变量	$Believe1$	社会信任	亲戚信任 (1 很信任, 5 很不信任)	1.423	0.747
	$Believe2$		村民信任 (1 很信任, 5 很不信任)	1.859	0.871
	$Believe3$		乡镇干部信任 (1 很信任, 5 很不信任)	2.991	1.177
	$Believe4$		城里熟人信任 (1 很信任, 5 很不信任)	2.256	0.972
	$Lijin_con$	礼金支出	礼金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	0.181	0.121
	$\ln tongxun$	信息通信支出	家庭信息通信费用 (话费和网费) 对数	7.428	0.792

(三) 模型设计

在基准回归中,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SWB_{i,t} = \beta_0 + \beta_1 nkakwani_{i,t} + \beta_2 x_{i,t} + u_i + e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SWB_{i,t}$ 是第 i 个农民第 t 年的主观幸福感; $nkakwani_{i,t}$ 为第 i 个农民第 t 年份的收入不平等指数; $x_{i,t}$ 为控制变量; u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e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乡土逻辑分为传统乡土逻辑和变迁后的乡土逻辑,模型设定如下:

$$SWB_{i,t} = \beta_0 + \beta_1 nkakwani_{i,t} + \beta_2 Believe_{i,t} + \eta_1 Believe_{i,t} \times nkakwani_{i,t} + \beta_3 x_{i,t} + u_i + e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SWB_{i,t} = \beta_0 + \beta_1 nkakwani_{i,t} + \beta_2 Lijin_con_{i,t} + \eta_2 Lijin_con_{i,t} \times nkakwani_{i,t} + \beta_3 x_{i,t} + u_i + e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SWB_{i,t} = \beta_0 + \beta_1 nkakwani_{i,t} + \beta_2 \ln tongxun_{i,t} + \eta_3 \ln tongxun_{i,t} \times nkakwani_{i,t} + \beta_3 x_{i,t} + u_i + e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2)和式(3)为传统乡土逻辑的模型,式(4)为变迁后的乡土逻辑的模型。其中, $Believe_{i,t}$ 为农民的社会信任,为“熟人社会”的代理变量; $Lijin_con_{i,t}$ 为礼金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为“人情礼俗”的代理变量; $\ln tongxun_{i,t}$ 为家庭信息通讯支出的对数,为现代网络的代理变量。 η_1 、 η_2 、 η_3 为调节变量与收入不平等指数交互项的系数,其余变量和参数与基准模型一致。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的模型设计,本文首先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而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1)显示收入不平等指数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且 p 小于 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模型(2)到模型(4)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使用混合回归模型,收入不平等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表明随着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农民主观幸福感会下降。

表 2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SWB	SWB	SWB	SWB
<i>nkakwani</i>	-1.283 *** (0.463)	-1.063 ** (0.501)	-1.062 ** (0.500)	-1.747 *** (0.337)
<i>Constant</i>	6.629 *** (0.175)	5.883 *** (0.936)	5.900 *** (1.004)	5.752 *** (0.454)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O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NO
<i>Observations</i>	780	780	780	1 038
<i>R</i> ²	0.020	0.063	0.063	0.023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分析

本文从 4 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采用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SWB	SWB	SWB	SWB	SWB	SWB	SWB	SWB
	更换变量		更换模型		缩尾处理		组层级	
<i>ncanberra</i>	-249.324 ** (108.060)	-250.408 ** (107.946)	-	-	-	-	-	-
<i>nkakwani</i>	-	-	-1.639 *** (0.464)	-1.639 *** (0.465)	-	-	-	-
<i>kakwani_w</i>	-	-	-	-	-1.071 ** (0.502)	-1.070 ** (0.502)	-	-
<i>nkakwani2</i>	-	-	-	-	-	-	-1.117 ** (0.507)	-1.117 ** (0.506)
<i>Constant</i>	5.985 *** (0.945)	5.950 *** (1.007)	-	-	5.877 *** (0.936)	5.901 *** (1.005)	5.823 *** (0.925)	5.814 *** (0.9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i>Observations</i>	780	780	780	780	780	780	780	780
<i>R</i> ²	0.065	0.065	-	-	0.063	0.063	0.064	0.064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内生性分析

本文将村内除本人以外其他家庭收入不平等均值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工具变量,使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表 4(1)和表 4(2)中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此外,该工具变量还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F 值为 11.33)和识别不足检验,证明了其有效性。最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4(3)所示,在引入工具变量后,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在 p 小于 0.1 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估计系数绝对值增大,这表明收入不平等的确会降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村庄层面的 Canberra 指数作为 Kakwani 指数的替代变量,记为 *ncanberra*。其次,基于序数效用论,将农民主观幸福感视作有序变量,采用面板 Ordered Logit 模型探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再次,为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家庭人均收入在村庄层面进行 2.5% 的缩尾处理,再重新计算 Kakwani 指数,记为 *kakwani_w*。最后,将农民的参照群体定义在村民组层面,按照村民组层级重新计算收入不平等指数,记为 *nkakwani2*。结果如表 3 所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即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越低。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i>nkakwani</i>	SWB	SWB
<i>Snkakwani</i>	-0.407 *** (0.115)	1.757 (1.183)	-
<i>nkakwani1</i>	-	-0.921 * (0.514)	-5.234 * (3.068)
<i>Constant</i>	0.777 *** (0.146)	4.346 *** (1.408)	7.693 *** (1.7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i>Observations</i>	780	780	780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异质性分析

1. 社会经历异质性

一般而言,具有一定社会经历的农民具有较

强的人际关系网络,其组织协调能力也较强,更容易获取社会资源,尤其是党员与经济收益之间往往存在着联系^[29]。此外,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使农民从精神上获得愉悦感,从而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本文根据社会经历的不同,将农民划分为普通农民与非普通农民,非普通农民是指在农民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或从事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作,在文中主要指有村委会干部、苹果经纪人和合作社干部等经历或有党员身份,而普通农民是指仅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村居民。如表5所示,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抑制非普通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普通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民群体内部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农民对村庄收入水平有更为全面的了解,相比较普通农民,会更加关注收入差距,所以收入不平等对非普通农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表5 农民社会经历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普通农民		非普通农民	
<i>nkakwani</i>	-0.957 (0.638)	-0.970 (0.639)	-1.961** (0.832)	-1.946** (0.792)
<i>Constant</i>	5.835*** (1.074)	5.323*** (1.164)	6.788*** (2.012)	8.166*** (2.2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NO	YES	NO	YES
<i>Observations</i>	585	585	195	195
<i>R</i> ²	0.058	0.063	0.173	0.216

注:***、**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教育异质性

教育在过去10年间对个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30]。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使农民获得更高的收益,从而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选取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8年作为高、低学历的分界点。将受教育年限大于等于8年的农民群体定义为高学历组,将受教育年限小于8年的农民群体定义为低学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高学历组的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更强,且 p 小于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低学历组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学历农民认知范围广,预期收入也会越高,相比较低学历农民会更加关注收入差距。所以,高学历组的农

民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表6 农民教育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高学历组		低学历组	
<i>nkakwani</i>	-1.758*** (0.626)	-1.771*** (0.624)	-0.046 (0.747)	-0.082 (0.734)
<i>Constant</i>	4.613*** (1.014)	4.418*** (1.117)	8.633*** (2.059)	9.297*** (2.0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NO	YES	NO	YES
<i>Observations</i>	514	514	266	266
<i>R</i> ²	0.148	0.149	0.033	0.039

注:***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 年龄异质性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划分,以55岁作为节点,将农民分为两组,中青年组(年龄 < 55 岁)和老年组(年龄 ≥ 55 岁)。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中青年组的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大于老年组的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且中青年组 p 小于0.1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老年组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地老年组的农民正逐步退出农业生产,部分年龄较大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子女赡养等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不再强烈。相比之下,正值年轻力壮的农民,由于经济压力相对较大,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更加敏感,从而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会更强。

表7 农民年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老年组		中青年组	
<i>nkakwani</i>	-0.723 (1.091)	-0.537 (1.119)	-1.027* (0.569)	-1.023* (0.571)
<i>Constant</i>	7.059*** (1.662)	8.028*** (1.861)	5.434*** (1.023)	5.358*** (1.0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NO	YES	NO	YES
<i>Observations</i>	176	176	604	604
<i>R</i> ²	0.048	0.056	0.085	0.085

注:***、*分别表示在 $p < 0.01$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 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确实会显著降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那么在乡土逻辑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收入不平等又会如何影响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呢?为了深入考察“乡土逻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使用交互效应模型验证假说H2和假说H3。

传统的乡土逻辑的回归结果如表 8 列(1)和列(2)所示,收入不平等与传统乡土逻辑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收入不平等引发农民主观幸福感变化的过程中,传统乡土逻辑中的“熟人社会”和“人情礼俗”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即传统乡土逻辑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说明由乡情取向衍生的社会关联在农民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假说 H2 得到验证。

变迁后的乡土逻辑是指现代网络冲击下形成的新型人际交往格局。现代网络通过时空收敛效应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地缘结构和关系结构,重新定义了传统乡村的社交空间概念。农村家庭信息通讯支出包含农村家庭的话费与网费支出,农村家庭家庭的信息通讯费用越高,表明对现代网络的接受程度越强,其交往格局变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表 8 列(3)表明,变迁后的乡土逻辑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即其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家庭信息通讯费用仅能反映农民对现代网络的接受程度,但未能反映农民对现代网络的利用程度,无法精确捕捉现代网络对农民人际交往格局的渗透作用。如在调研中发现,虽然部分农民开通了互联网,但对其而言网络操作难度较大,利用程度较低。

表 8 乡土逻辑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传统乡土逻辑		变迁后的乡土逻辑
	SWB	SWB	SWB
<i>nkakwani</i>	-1.128 ** (0.487)	-1.083 ** (0.503)	-1.021 ** (0.498)
<i>Believe</i>	0.204 (0.125)	-	-
<i>Linjin_con</i>	-	-0.041 (0.924)	-
<i>Intongxun</i>	-	-	0.348 *** (0.129)
交互项	0.830 ** (0.384)	5.766 * (3.402)	-0.562 (0.6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i>Observations</i>	780	780	780
<i>R</i> ²	0.085	0.070	0.079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与 $p <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事实上,现代网络向农民提供了近乎零成本的信息获取渠道和网络社交平台。变迁后的乡土逻辑最本质地体现在现代网络环境对农民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信息力量和信息权力在现代网络的推动下发展强大,使农民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脱嵌形式。为了进一步确定变迁后的乡土逻辑是否在收入不平等影响农民的主观幸福感过程中起作用,选取农民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作为变迁后乡土逻辑的代理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平时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有哪些?”来测量农民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其中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分为 6 类,即村中公告板和广播、报纸和书籍、网络、口口相传、电视和其他方式。本文进一步将该变量分为两类,即网络与其他。一般而言,借助网络获取外部信息的农民会更容易突破传统乡土逻辑中的地域空间限制,形成信息流动下的新型人际交往格局。由于 2016 年社交软件在样本区域尚未普及,故该数据在 2016 年调研中并未涉及,因而本文仅使用 2021 年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并加入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和社会经历等个体特征变量,对 2021 年数据进行清理,得到有效样本 427 个。

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通过网络获取外部信息的农民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更大,而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外部信息的农民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较弱,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现代网络可以使不同阶层或相距较远的陌生人开展缺场交往,扩大了农民的潜在收入比较范围和交往空间,扩增了原本“熟人社会”的边界范围和群体空间。习惯

表 9 农民获取外部信息渠道分析结果

变量	(1)	(2)
	网络	其他
	SWB	SWB
<i>nkakwani1</i>	-1.678 *** (0.600)	-1.255 (0.962)
<i>Constant</i>	5.464 *** (1.412)	2.330 *** (2.4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288	139
<i>R</i> ²	0.109	0.064

注:*** 表示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于以网络获取外部信息的农民比较范围更加广阔,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更为强烈,所以,该群体农民的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更强。综上,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假说 H3 得到验证。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 结论

(1) 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抑制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且该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模型、剔除异常值和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2) 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即对非普通农民、高学历农民、中青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显著,而对普通农民、低学历农民、老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3) 在农村社会中,乡土逻辑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其中,传统乡土逻辑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而变迁后的乡土逻辑会放大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

(二) 对策建议

第一,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关注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当前,我国农民收入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应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加快促进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助推农村居民收入的向上流动,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此外,还应不断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进一步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红利惠及所有农民。在重视城乡收入“大分配”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关注农村内部的“小分配”,持续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切实、直接地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第二,理性看待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该理性

看待村庄内部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循序渐进地推进共同富裕。收入不平等是各国长期存在普遍性问题,逆转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现状也应从长期考量。在农村社会,农民对收入不平等也具有一定的容忍度。换句话说,部分农民认可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以收入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大,而收入不平等对乡村精英、乡贤能人以及经济压力较大的农民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较大。因此,既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农民群体勤劳致富创造条件、提供环境,允许个体间的差异化发展,又要不断完善分配制度体系,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创造人人参与、普惠公平的发展环境。

第三,强化传统乡土逻辑蕴含的人情规范,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乡村的发展,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在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下,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村的伦理和道德建设,破除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将乡村地区打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齐头并进。当前,现代网络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但现代传媒捕风捉影的失真内容会使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增强。所以,一方面要规范网络环境、整治互联网上低俗之风,引导平台和广大网民制作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产品,加强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推动“数字性”与“乡村性”同频共振;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打造自信繁荣的乡村网络文化环境,以“小文明”赋能“大振兴”,为实现共同富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本文研究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认识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乡土逻辑在农民群体中的调节作用。但本文的研究结论仅是基于陕西富县两个苹果专业村调研数据,考虑到中国是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地域差异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明显。那么,扩大样本

区域后的研究结论是否与本文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尤亮, 杨金阳, 霍学喜. 绝对收入、收入渴望与农民主观幸福感: 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 41(3): 16-30.
- [2] 陈宗胜. 综合运用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及分配举措推进共同富裕[J]. 经济动态, 2021(10): 19-33.
- [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 4-8.
- [4] 岳经纶、张虎平. 收入不平等感知、预期与幸福感: 基于 2017 年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 11(3): 100-119, 211-212.
- [5] DING J, SALINAS-JIMENEZ J, SALINAS-JIMENEZ M M.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case of China[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21, 22(2): 845-866.
- [6] VEZZOLI M, VALTORTA R R, MARI S, et al. Effect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underlying mechanisms[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23, 53(2): 85-100.
- [7] 罗必良, 洪伟杰, 耿鹏鹏, 等. 赋权、强能、包容: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 2021, 37(10): 166-181, 240, 182.
- [8] 陈波, 徐若蓝.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 以二官寨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2(12): 61-71.
- [9] 郑方辉. 全面乡村振兴: 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3): 136-150, 207.
- [10] ZHANG Q, CHURCHILL S A.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0): 101392.
- [11] 陈钊, 徐彤, 刘晓峰. 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 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2, 35(4): 79-101.
- [12] 吴菲, 王俊秀.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J]. 社会, 2017, 37(2): 74-105.
- [13] 马红鸽, 席恒.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J]. 社会保障研究, 2020(1): 86-98.
- [14] KOMASTU S, SUZUKI A.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levels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a panel data analysis[J]. The Chinese economy, 2023, 56(2): 104-123.
- [15] NGAMABA K H, PANAGIOTI M, ARMITAGE C J.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8, 27(3): 577-596.
- [16] 黄嘉文.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 社会, 2016, 36(2): 123-145.
- [17] 种聪, 岳希明. 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感提高: 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4): 24-45.
- [18] 张丽思, 张紫薇. 收入不平等、社会公平与主观幸福感[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4): 48-58.
- [19] ALESINA A, DI TELLA R, 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8(9): 2009-2042.
- [20] 朱诗娥, 杨汝岱, 吴比.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 1986—2017 年[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63-72.
- [21] 万广华, 张彤进. 机会不平等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J]. 世界经济, 2021, 44(5): 203-228.
- [22] 陈柏峰. 半熟人社会: 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7, 342.
- [23] 张旺, 白永秀.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及优化路径[J]. 中国软科学, 2022(1): 132-146.
- [24]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6.
- [25] 王璐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89-109, 201.
- [26] 张鹏龙, 胡羽珊, 王亚华. 农业保险对农户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含义: 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3(3): 42-51.
- [27] 杨子砚, 文峰. 从务工到创业: 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J]. 管理世界, 2020, 36(7): 171-185.
- [28] 罗明忠, 刘子玉. 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8): 114-131.
- [29] 陈钊, 陆铭, 佐藤宏. 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 经济研究, 2009, 44(10): 121-132.
- [30] 李实, 朱梦冰.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 管理世界, 2022, 38(1): 52-61, 76, 62.

(本文责编: 辛 城)